

何定生與《古史辨》的《詩經》研究

車行健*

一、前言

何定生(1911-1970)，廣東揭陽人，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間就讀於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國文系，係顧頡剛(1893-1980)早年在廣州中山大學時期的學生¹。

一九二九年二月退學隨顧頡剛北上北平學習²，但因種種細故，與顧頡剛發生摩擦，一九三〇年代後遂疏離於顧頡剛的學術圈。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顧頡剛為避日軍而匆忙逃離北平，從此師生二人便因戰亂的阻隔而聯繫遂疏。一九四八年何定生又隨國民政府渡海來臺，更斷絕了與顧頡剛的聯絡。此後直至何定生在臺逝世，終生未再與顧頡剛聯繫³。雖然何定生與顧頡剛實際相處的時間不過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間⁴，而有密切互動的時間也不過兩年多⁵，但何定生終

本文為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民國時期罕傳經學論著之整理與研究：以羅倬漢、陳延傑與蘇維嶽三家之著作為中心(II)」(計畫編號：NSC 101-2410-H-004-109)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發表於德國特里爾大學(University of Trier)漢學系主辦之「經學與社會應用」(Confucian Canon Studies and Its Social Applications)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7月28日。

*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 ¹ 楊晉龍：〈何定生教授年表初稿〉，《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5-7。
- ² 顧潮：《顧頡剛年譜(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92。
- ³ 關於何定生與顧頡剛的往來關係，請參車行健、徐其寧：〈顧頡剛與何定生的師生情緣〉，收入車行健：《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年)，文中敘述見頁193-208。案：此文原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53-66。
- ⁴ 顧頡剛於一九二七年四月應聘為廣州中山大學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同年十月，何定生始選修顧頡剛的課。何定生最後一次拜謁顧頡剛的紀錄是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參楊晉龍：〈何定生教授年表初稿〉，頁5、11；車行健、徐其寧：〈顧頡剛與何定生的師生情緣〉，頁193、207。

其一生卻受到顧頡剛極大的影響⁶，山東大學歷史系的王學典教授在其主撰的《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特列一章〈始於愛而終於離——顧頡剛與何定生〉，專門探討二人的關係，並將其列在顧頡剛其他諸位聲名昭著的弟子們——包括譚其驤(1911-1992)、童書業(1908-1968)、楊向奎(1910-2000)、劉起鈞(1917-2012)等人——之中的第一位⁷，確實可見何定生在顧頡剛諸多弟子中具有一種無法為他人所取代的特殊地位，而此地位建立在顧頡剛大學教學生涯初始與何定生之間親密的師生關係。用一般更通俗的話來講，何定生實際上可稱作顧門的「大弟子」，或顧頡剛諸多弟子中的「大師兄」。

何定生早年曾有數篇關於《詩經》的論文刊載於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第三冊中，而其晚年也曾為文評論《古史辨》及《古史辨》中的《詩經》研究成果（參第二、三節）。有鑑於《古史辨》與顧頡剛的關係，既然何定生是顧頡剛早年極為親近的弟子，則何定生本人是否從屬於所謂的「古史辨派」⁸？自然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但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還是得先將所謂「古史辨派」的定義做一番探討。

顧名思義，所謂「古史辨派」自然是跟《古史辨》這套專門討論古史問題的書

⁵ 主要集中於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間，參車行健、徐其寧：〈顧頡剛與何定生的師生情緣〉，頁193-206。

⁶ 何定生晚年在臺灣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曾志雄教授的這段回憶頗令人動容：「一九七〇年四、五月，大概是我認識何老師以來他身體最好的時候。那時何老師大部分時間都能夠到教室上課，從他上課的表情少了變化看，他的心情應該平穩一點了。下課的時候，師母來接他。有時候，我也陪他們走上一段路。在路上，何老師通常不太說話，跟剛才上課的時候明顯不一樣，心情像變得頗為沉重似的。偶而他會發出深沉的歎息，一面走一面喃喃自語：『唉，顧老師啊！甚麼時候能見您呢？老師啊——』『老師啊！能看見我的書，那多好啊！』之後就是一大段沉默，神情無奈。他說這話是斷斷續續的，聲音很小，可是嗓音清晰，還是能夠讓身邊的人聽清楚。這種情形已經不止兩、三回，所以每回當他在路上開聲歎息的時候，我幾乎都可以料想到他要說哪幾句話，為盼望誰而歎息。雖然我不曾聽過何老師說顧頡剛怎樣影響他，可是在這短暫的十秒八秒的歎息裏，就足以讓我知道顧先生真的影響了何老師一生了。」見曾志雄：〈永遠的懷念——紀念何定生教授逝世四十週年〉，《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73。

⁷ 王學典：〈始於愛而終於離——顧頡剛與何定生〉，《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81-122。案：文中對諸位弟子的羅列係根據該書篇章排列的次序。

⁸ 楊向奎即如此稱呼，他曾在〈論「古史辨派」〉（收入《中華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一文中，對以顧頡剛和童書業為主的該學派學術內容做過評論。又劉起鈞亦認為《古史辨》的出版，「於是在中國史學界裏，出現了一個以『疑古』為旗幟的『古史辨派』」。見劉起鈞：《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31。

分不開的，顧頡剛的弟子楊向奎對《古史辨》曾有如下的敘述：

從一九二六年《古史辨》第一冊結集出版到一九四一年《古史辨》第七冊結集出版，先後共十五年的光景，參加中國古代史討論者有多人，而主將始終是顧頡剛先生。後期，《古史辨》第七冊的主編是童書業教授，他是頡剛先生古史學說的發揮者。⁹

楊向奎在〈論「古史辨派」〉一文中主要是以顧頡剛和童書業二人為討論對象。似乎從他的角度來看，顧、童二人顯然就是古史辨派的核心人物，這也可以說是古史辨派最嚴格、最狹隘的定義。

當然，作為現代人文學界有影響力的學術流派，古史辨派當然不會只有顧頡剛和童書業二人，凡是有參加以顧頡剛為主導的古史討論，並有文章登載或收錄在《古史辨》中者，都有可能是該派中的一員。如何定生登在《古史辨》第三冊中的〈關於詩的起興〉一文，其中部分論點為莫礪鋒在《朱熹文學研究》書中所批評，莫氏就稱何定生為「《古史辨》學者」¹⁰。但並非凡有文章登在《古史辨》中的學者皆屬於古史辨派，如胡適(1891-1962)和錢穆(1895-1990)的文章皆可在《古史辨》中看到，但恐怕不太會有人視他們為「古史辨派」或「《古史辨》學者」¹¹。

除了文章登載在《古史辨》七冊中這個基本條件外，至少還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即：與顧頡剛有一定程度的師友交遊關係，以及認同《古史辨》學風，二者符合才算古史辨派學者。只存在師友交遊關係，但為學理念和治學方向與《古史辨》

⁹ 楊向奎：〈論「古史辨派」〉，頁 11。

¹⁰ 莫礪鋒：《朱熹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39。

¹¹ 夏傳才雖亦認為不見得在《古史辨》發表過文章便是一派，但他持動態的發展觀念，還是肯定那些在《古史辨》發表過文章的學者，「至少在一定時間內他們的觀點有一致之處，並且彼此聯繫，有過合作關係」。但至於後來的發展就另當別論了。（見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頁 109）所以就胡適和錢穆二人的情況來說，他們的理念與治學方向的確在某一特定時期（二十年代）與《古史辨》接近，或可稱為同道或戰友，但後來又遠離，終致分道揚鑣。又案：誠如王汎森所言：「《古史辨》是由許多史家在不同刊物上發表的文字所選輯而成，但它們之所以編排在一起，實因有共同的脈絡貫穿其間，形成幾個論域 (discourse)，所以收集在這七大冊書中的文字不管是贊成、修正或反對對方的論點，卻都是在同一個棋盤上下棋，應該放在一起來分析與描述。」（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87 年〕，頁 289）這些為文贊成、修正或反對的學人都可以視作是古史辨運動的參與者，但並不一定都是《古史辨》派者，只有那些贊成、支持與認同古史辨運動的人才有可能是《古史辨》派的學人。

學風大異其趣，也不能算是古史辨派。楊向奎就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子，他既是顧頡剛的弟子，早年與顧頡剛有密切的師生關係，且亦曾為文登載在《古史辨》中，參與古史的討論。但他後來公開聲稱不屬於古史辨派，且曾多次為文公開批判顧頡剛，強烈表達不認同其理念¹²。因此，若將楊向奎視為古史辨派，恐有違實情。但若僅認同或私淑《古史辨》的治學理念，卻並無與《古史辨》主要人物有直接而親近之交遊關係，亦不曾有文刊載在《古史辨》中，恐也很難說是屬於古史辨派。如在一九八一年出版《左傳疏證》，論證《左傳》為劉歆所偽作的徐仁甫（別名徐行，1902-1988），其治學理念與《古史辨》相合，且曾與顧頡剛通信¹³，但他既非《古史辨》的作者，又未與顧頡剛有較為親近的師友交遊關係，頂多只能說他是古史辨派的同道，而不能將其列入古史辨派中。因此，真正的古史辨派應是那些認同《古史辨》治學理念，又與《古史辨》核心人物顧頡剛具有一定程度的師友交遊的親近關係，且圍繞著《古史辨》來討論古史問題與發表研究成果的學術社群¹⁴。事實上，這個學術群體從局外人的角度來看，應是具有高度辨識性的，就如同顧頡剛在一九三〇年代創辦的《禹貢》半月刊及禹貢學會，也聚集了一批有志鑽研歷史地理學的同道及學生，他們的做為及表現引起了中外學界的注視，為此日本學者森鹿三（1906-1980）還曾於《東洋史研究》第一卷第二號寫了〈《禹貢》派的人們〉一文加以評

¹² 參車行健：〈論楊向奎的經今古文學觀〉，預定刊載於《政大中文學報》第21期（2014年6月）。

¹³ 《顧頡剛全集》中之《書信集》卷三共收有六通顧頡剛致徐仁甫的書信，通信時間均集中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間。參顧頡剛：《書信集》卷3，收入《顧頡剛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1冊，頁511-515。案：此六通信均錄自徐仁甫：〈記顧頡剛先生論《左傳》及對《左傳疏證》的期許〉，王煦華編：《顧頡剛先生學行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405-410。又案：關於徐仁甫《左傳疏證》的研究，可參宋惠如：〈從重建古史到重省學術史——徐仁甫（1902-1988）《左傳疏證》研究及其意義〉，發表於「新中國六十年的經學研究（1950-2010）第二次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2011年11月3日。

¹⁴ 從某種角度來說，參與古史問題討論，而又有文章被收入在《古史辨》中的學界中人，即已意味著與顧頡剛有一定程度的互動關係，否則彼此之間根本毫無交集，文章也自然不可能會登載在《古史辨》中，但這中間又勢不可避免地會存在著與顧頡剛親疏遠近不等的關係。廣義上的古史辨派，包括所有那些在古史辨運動期間，因認同《古史辨》學風而參與其相關討論，繼而文章又被收入《古史辨》中，且與顧頡剛有所互動往來的學人們。至於較狹義也可說較核心的古史辨派，自然就是那些與顧頡剛關係最為緊密親近的師友門生們。

介¹⁵。類比這種稱呼，也不妨將這個學術群體稱為「古史辨派的人們」¹⁶。

討論過了「古史辨派」的定義之後，接下來要探討的就是何定生與《古史辨》的關係，或更直接地提問：何定生屬不屬於古史辨派？首先，何定生確曾在《古史辨》登載文章，臺北明倫出版社於一九七〇年翻印《古史辨》時，特邀毛子水(1893-1988)、徐文珊(1900-1998)、何定生與陳槃(1905-1999)四位曾與《古史辨》或顧頡剛有密切關係的遷臺學者為文誌念，顯係注意到何定生為《古史辨》中的作者這一事實¹⁷。其次，他曾為顧頡剛的門生，儘管後來二人因嫌隙而疏離，又因動亂而失聯，但何定生文章登載在《古史辨》第三冊的當時，他們的確還維持著極為親密的師生關係。第三，尤其重要的是，何定生終其一生的學風及主要學術觀點仍繼承著顧頡剛在《古史辨》中所開展的學風。由此來看，何定生確實可以稱得上是古史辨派的學者，而他的治學成果主要就表現在《詩經》學。

二、何定生與《古史辨》的翰墨因緣

何定生早年就讀廣州中山大學時曾寫過兩篇有關《詩經》的論文，即〈詩經之在今日〉與〈關於詩經通論與詩的起興〉，前文寫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原載廣州《民國日報》副刊；後者撰於一九二九年五月，原載《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九集第九十七期，一九二九年九月四日出版。他寫作此文時已退學隨顧頡

¹⁵ 森鹿三撰，周一良譯：《〈禹貢〉派的人們》，《禹貢》半月刊第5卷第10期（1936年7月16日），頁65-68。案：在顧頡剛主持《古史辨》編務時期，由於其樂於提攜後進，所以收錄了不少學生或學界後進的文章，這些人與顧頡剛形成緊密的關係，形成「顧頡剛的弟子們」。這些門生弟子也與「古史辨派的人們」有重疊的關係，就如同「《禹貢》派的人們」的情況。

¹⁶ 與古史辨派相接近的概念厥為所謂的「疑古學派」。但二者仍有所不同，大體來說，後者範圍較廣，可以涵攝前者；但前者只能集中在《古史辨》中，範圍較窄，不能將二者等同而說疑古學派即為古史辨派。

¹⁷ 四人中除毛子水外，皆曾為顧頡剛的學生，且皆亦有文章刊載在《古史辨》中。毛子水雖無文刊於《古史辨》中，然其早年與顧頡剛為舊識，其嘗自謂：「傅（斯年）、顧（頡剛）二位是我在北大預科時最為志同道合的學友。」見宋淑萍：〈毛子水先生傳〉，《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0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年），頁194。又《顧頡剛日記》從一九二四至一九四三年間記錄二人互動處甚多，甚且《古史辨》第一冊出版時，顧頡剛還在日記中將其列為應贈送人之一。（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卷1，頁799，「1926年9月30日」）凡此皆足以印證毛子水早年確與顧頡剛有著深厚的交誼。

剛北上故都北平，所以實際的撰作地點是北平而非廣州¹⁸。當顧頡剛於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間編輯《古史辨》第三冊時¹⁹，將這兩篇文章收入《古史辨》第三冊下編，並且又將〈關於詩經通論與詩的起興〉析分成〈關於詩經通論〉與〈關於詩的起興〉兩篇。此是何定生與《古史辨》結緣的始末，而這不但使其成為《古史辨》的作者群中之一員，且亦使他有資格擁有「古史辨派」或「《古史辨》學者」，這樣一個在現代人文學術史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頭銜甚或學術光環。

何定生當年刊登在《古史辨》中的文章，或許仍帶有些許初學者的青澀稚嫩，但也充滿蓬勃的朝氣與初生之犢的銳氣。在〈關於詩經通論〉文中，他對當時才剛被學界所注意的姚際恆(1647-c. 1715)的《詩經通論》做了初步但又不失尖銳的評析。首先，他承認此書在《詩》學史上及在《詩》研究上，確實是一部難得的重要著作。他接著指出姚氏的冀圖不但要推翻《詩序》，而且還想推翻反《詩序》的朱熹(1130-1200)《詩集傳》。雖然朱子的《集傳》之學算是《詩經》學的革命派，但姚氏仍不滿意，嫌朱子不夠徹底，是個調和派，姚氏想別樹一幟地進行徹底革命。其次，何定生進一步指出，姚氏的態度既非如清代的學者，先據毛、鄭以倒朱，再依三家以倒毛，而是各派混戰中超然的一派。他想自己披荊斬棘，去敲開《詩經》的門。第三，何定生認為，姚氏實在也只有這種可貴的精神，因為他並不會比朱熹更高明。如在對待《詩序》的態度上，姚氏雖罵《詩集傳》「佞《序》」，但他自己也仍不徹底，有時也用《序》。此外，他對淫詩問題的見解就遠不如朱熹，甚至為了打倒《詩集傳》，姚氏不惜反對淫詩，甚至不惜替美刺說張目。因此在何定生看來，姚氏的見解也不會比朱熹高明。最後，何定生肯定姚氏的可貴精神，就在於他的嚴刻的不輕易相信這點上²⁰。姚書的最大價值，就在於其體現了嚴格的懷疑精神，不輕易相信既有的權威的說法，由此看來，何定生此文的觀點確實是很「古史辨的」，背後顧頡剛的身影隱約若現。事實上，據何定生晚年自述，此文之作乃他在廣州中山大學一年級時，在當時讀《詩》風氣下，顧頡剛將姚際恆《詩經通論》介

¹⁸ 何定生：〈關於詩的起興〉，《古史辨》（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第3冊下編，頁705。

¹⁹ 據顧潮《顧頡剛年譜》所載，顧頡剛編校《古史辨》第三冊始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此編校工作又一直持續至一九三一年，直至該年十一月，該冊才正式由北平樸社出版。參顧潮：《顧頡剛年譜》，頁213、219、220-221。

²⁰ 以上敘述參何定生：〈關於詩經通論〉，《古史辨》，第3冊下編，頁419-423。

紹給他，並命他寫批評，結果在急就之下所寫出來的文章²¹。

至於〈關於詩的起興〉一文，其中主要的觀點，用他晚年的自述，即是：「完全是個鄭樵主義的。」²²他對於鄭樵(1104-1162)的觀點皆抱持高度讚賞與認同的態度，如：「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嗚呼！詩在於聲，不在於義。」²³何定生從鄭樵的觀點得到啟發，從聲音、歌謠的角度出發，認為作為詩的起頭的興句是和下文沒有意義上的關連，他給「興」下的定義就是：「歌謠上與本意沒有干係的趁聲。」²⁴他自承所主張的鄭樵「唯聲主義」和其師顧頡剛的「協韻起頭說」有點暗合²⁵，且何定生為了證成他的觀點，在此文中還援引了後世兒歌民謠來做例證²⁶，這種做法除了受當時風氣的影響，最直接的影響恐仍與顧頡剛之提倡歌謠研究，且利用歌謠來論證《詩經》相關問題的做法脫離不了關係²⁷。

〈詩經之在今日〉是何定生三篇收入《古史辨》第三冊文章中最早寫成的(一九二八年七月)，也是內容較單薄的一篇。何定生在這篇於二十分鐘內寫完的文章中，除複述他三年前十四、五歲時所作的〈詩經的文學觀〉，把《詩經》的性質用歌謠來解釋的論點外，也對自己研究《詩經》的過程做了回顧。其自述青少年時期學識見聞有限，只在《學海類編》中找到宋代程大昌(1123-1195)的《詩論》及在《四部叢刊》中找到蘇轍(1039-1112)《欒城應詔集》裏的一點材料。後來看到顧頡剛的〈詩經之厄運與幸運〉，其中展示的研究《詩經》的方法之周詳廣大，繁複多方，才使其大吃一驚。後來陸續又看見謝无量(1884-1964)的《詩經研究》，以及各種雜誌上如雨後春筍般談論關於《詩經》一類的文章，皆使其眼界大開。因此他所謂「《詩經》之在今日」的意思，便是他當時建議若要談論《詩經》時，至少宜從顧頡剛及其他零碎之作與俞平伯(1900-1990)等所編列之外有所發現者入手，否則捨人殘棄牙慧，在他看來也是挺無聊的。此外，他還建議應要有歷史的眼光與

²¹ 何定生：〈詩經的復始問題〉，《詩經今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卷2，頁77。

²² 同前註，頁186。

²³ 何定生：〈關於詩的起興〉，《古史辨》，第3冊下編，頁699-700。

²⁴ 同前註，頁702。

²⁵ 何定生：〈詩經的復始問題〉，《詩經今論》，頁186。

²⁶ 何定生：〈關於詩的起興〉，《古史辨》，第3冊下編，頁700-701。

²⁷ 顧頡剛之提倡歌謠研究，見氏撰：〈自序〉，《古史辨》，第1冊，頁37-40、75-77。顧頡剛利用歌謠來論證《詩經》者有〈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古史辨》，第3冊下編，頁589-592)、〈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古史辨》，第3冊下編，頁608-658)等二文。

常識，倘若以二十世紀的思想來律一切過去的見解，如此做法實不可行²⁸。此文令人注意之處倒不在於他所提出來的實際觀點如何（如《詩經》與歌謠的關係，及《詩經》研究方式的建議等），而在於敘述他早年《詩經》研究與觀點的形成過程。雖然顧頡剛確實是影響他至為鉅大的關鍵人物，但他在接觸顧頡剛著作前的青少年時代即已注意到《詩經》與歌謠的關係，包含興句與本詩沒有多大關係；換章只換韻脚，於本詩意義沒有改變；不同篇之詩有相同的句子等，這些地方使他注意到了聲的關係。此外，他也開始利用後世歌謠來為其論點進行論證，甚至他在見到鄭樵的言論後更加確定他的見解²⁹。這顯示出的意義是：何定生的《詩經》研究固然受到顧頡剛的直接影響，但他在接觸到顧頡剛的觀點前並不是白紙一張，也不是如陳相見許行般之「盡棄其學而學焉」，而是已有一定根柢，相當學養，且學術觀點、為學進路及學問興趣適與顧頡剛相契合，遂在遇到當時學問已卓有成就的顧頡剛之後，便傾心學習，跟隨顧頡剛疑古辨偽的步伐，投入《詩經》的研究。這種關係多少類似於當年顧頡剛追隨甫留美歸來的胡適所開創的新穎治學方法的情況³⁰，這樣的師生情緣及學問傳承影響關係，確實極具意義與特色。

三、何定生對《古史辨》的《詩經》研究的評析

何定生與《古史辨》的《詩經》研究的關係，不只表現在其文曾收入在《古史辨》中，而成為《古史辨》作者群中之一員，更顯示在他晚年自覺地為《古史辨》中的《詩經》研究成果做系統性的評判，其中自然也包含他早年的文章。不同於學生時代所作之《詩經》論文之青澀與倉促，晚年的評判係立基於其數十年持續研究《詩經》所積累之深厚學養，一方面呈顯出其《詩經》學的成熟觀點，另一方面也表達出他對《古史辨》的《詩經》研究的具體成果所做之深入回顧與反省。而這種回顧省思的工作又是來自於參與者的見證與現身說法，與站在《古史辨》外，用純

²⁸ 以上敘述參何定生：〈詩經之在今日〉，《古史辨》，第3冊下編，頁690-694。

²⁹ 同前註，頁690-693。

³⁰ 顧頡剛只比胡適小兩歲，且其舊學根柢亦不遜於胡適。但顧頡剛大二時，聽了傅斯年(1896-1950)的推薦，去旁聽剛從美國留學歸國的胡適在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設的「中國哲學史」，從此以後對胡適非常信服。參顧頡剛：〈自序〉，《古史辨》，第1冊，頁36。相關討論又參王學典：《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頁8-10。

粹客觀中立的態度來檢視《古史辨》的《詩經》研究成果者，如此確實增加了不少的說服力與親切感，其學術價值不容小覷³¹。

何定生對《古史辨》的《詩經》研究成果所做的評騭，主要展現在〈詩經的復始問題〉一文中。此文收入《詩經今論》卷二，原題作〈詩經的復古解放問題〉。

所謂「復古解放」，照何定生的意思，是在周樂亡後，樂歌失其原始用途，三百篇的原始面目便逐漸被掩埋。漢儒所倡之「諫書」思想一直籠罩著後世，即使宋、清學人對於漢儒的附會雖也頗有爭執，但在「諫書」思想的基本觀念上，仍與漢儒同一立場。因此在他看來，今日若要研究《詩經》，非從漢、宋、清學，乃至戰國之儒，如孟、荀、《學》、《庸》之學解放出來，以復於春秋以前之古，如此才有獲得真相的可能。而唯有三百篇回到春秋以前之古後，方可覘其本始地位，而詩人之意乃可從原始的解釋得到解放，他認為這才是研究《詩經》最終的目標³²。由於《詩經》的復古解放問題在民國初年時與其他的古史問題，同樣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激盪而被熱烈討論，所留下來的三十萬字的幾十篇論文，仍不失其為所謂「啟明期」重要文獻的意義與價值³³，因此何定生便決定將這些收錄在《古史辨》中的論文做文摘式的輯錄，並仿效方東樹(1772-1851)《漢學商兌》的方式引述各文，並加以批評³⁴。但何定生作此文並非只是消極地作學術史的回顧，事實上他有更積極的目的，即是「寄意於新解題的問題」，希冀可以提供「今後研究《詩經》的新方向和實例」³⁵。

³¹ 這種情況頗類似梁啟超(1873-1929)，他親身參與和見證了晚清以其師康有為(1858-1927)為中心的今文學思潮和變法改革運動，而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也將自己視為晚清學術史的組成分子而加以敘述和評論。這樣的論述方式是否忠實於歷史？其客觀性又如何確立？……等問題暫且不顧，即使僅將其論述視為歷史參與者的證詞或現身說法，相信仍是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³² 以上敘述參何定生：〈詩經的復始問題〉，《詩經今論》，頁1-2、74。

³³ 同前註，頁1-2。

³⁴ 同前註，頁80。

³⁵ 同前註，頁2。案：何定生曾於一九六四年年底時擬訂爾後研究《詩經》之計畫，其云：「今日研究《詩經》工作，皆破碎片斷，最好從字義（包括詞彙、成語辭句等）做徹底研究，然後詩可貫通。若做字典編排，從字、詞、片語、成語的關係，以尋求章句的特徵，必可窺詩旨的消息，然後可及詩人的意志也，如此則《詩經》可讀矣。我以為今日研究古書，必能使之現代化——即使現代人可讀，才是有意義的工作。《詩經》乃古典文學的第一部書，我欲為此闢一新途徑，以為拓展之始。」（楊晉龍：〈何定生教授年表初稿〉，頁17）所謂「詩旨的消息」和「詩人的意志」即解題的主要內容。對何定生來說，研究《詩經》的最終目的，就在於「尋求詩文最後（也可說

何定生在此文中將《古史辨》中的《詩經》研究論文分為六類：(一)《詩經》的一般綜合問題、(二)《詩序》問題、(三)專書討論、(四)歌謠問題、(五)起興問題、(六)詩解舉例。他的做法大體上是在各類中針對相關的重要論文做文摘式的評述，唯有第六類是針對《古史辨》所討論的詩篇做綜合性的評析，並不對個別論文的內容做摘要及評論。以下分別對各類的評述意見做一番考察。

(一)就《詩經》的一般綜合問題而言，何定生共評析了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胡適〈談談詩經〉、顧頡剛〈讀詩隨筆〉與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收入《古史辨》第一冊中編)論《詩經》的輯集問題、張壽林〈詩經是不是孔子所刪定的?〉、俞平伯〈論商頌的年代〉與陳槃〈周召二南與文王之化〉等六組七篇文章。他對其師顧頡剛的〈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原題作〈詩經的厄運與幸運〉)一文極為推崇，既稱許為「新文化運動以來有關《詩經》問題第一篇最具爆炸性的文字」³⁶、又讚揚此文在此次《詩經》問題的討論中，「為最具全面的重要性」、「最有分量之作」³⁷。事實上，何定生對此文評析所用的篇幅也是最多的，遠超過對其他論文的評論。由此皆可看出何定生對此文的重視。

此文共分五節，第一節「傳說中的詩人與詩本事」，顧頡剛用樂歌的觀點來述說《詩經》的起源，何定生認為是最接近事實的，而且他也贊成顧頡剛關於三百篇的作者和本事不能希望有一個完滿回答的說法³⁸。第二節「周代人的用詩」，顧頡剛指出若要看出《詩經》的真相，最應該研究的就是周代人對於詩的態度，而這就不得不研究當時人用詩的方法。他歸納出來大概可分為典禮、諷諫、賦詩和言語等四種用法。但何定生卻以為《詩經》的諷諫作用甚為微小，除了諷諫的詩歌外，還有男女私情、民生疾苦、吟詠情性一類的詩歌，都是藉著「無算樂」才入樂的。這些樂歌最大的意義在於賓主盡歡，因此諷諫作用可發揮的機會就更少了。何定生批評顧頡剛不從諷諫作用和樂歌的客觀關係上來認識諷諫的客觀效果，卻去相信《左

就是本始)的解釋」(〈讀詩綱領〉，《定生論學集——詩經與孔學研究》[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頁13)。何定生欲編纂《詩經辭典》，顯然是為《詩經》新解題而準備；而有了《詩經》新解題，方能使《詩經》為現代人可讀。

³⁶ 何定生：〈詩經的復始問題〉，《詩經今論》，頁75。

³⁷ 引文分別見同前註，頁81、105。

³⁸ 同前註，頁83。

傳》和《國語》中那些和三百篇毫不相干的「獻詩、獻曲」一類的傳說³⁹。何定生極看重散歌散樂（無算樂）的作用，他認為正歌重在行禮，而無算樂則專主娛賓，故內容能愈輕鬆愈好，這也是三百五篇詩之不能不有半數以上的散歌（相當於漢人的變詩）的道理。他對顧頡剛未能從這點上來把握感到惋惜，認為是一個大弱點⁴⁰。但他卻很稱許顧頡剛對春秋時「賦詩斷章」的認識，認為此節結論所說「他們無論如何把詩篇亂用，卻沒有傷損《詩經》的真相」的話為最得間⁴¹。第三節「孔子對於詩樂的態度」，何定生雖認為顧頡剛既知道孔子用詩的方法和春秋人一路，但從他無一語涉及「思無邪」的問題這一點看出，其對於孔子對詩樂的態度之認識仍嫌不足⁴²。第四節「戰國時的詩樂」，何定生申述顧頡剛的觀點，認為戰國時雅樂既已失傳，三百篇無所憑藉，戰國時代之儒只好藉詩文來講義理。所以就時代言，這是個詩樂的變形時期，但就儒術而言，卻是《詩經》學的胚胎時代⁴³。第五節「孟子說詩」，對文中關於「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的解釋做了番批評，認為孟子非如顧頡剛所說的，將「《詩》亡」和「《春秋》作」二事連在一起，因為這分明是講不通的⁴⁴。

何定生肯定此文所涉及的範圍，已包括了今日所應提出《詩經》問題的主要部分，如三百篇何以能集合在一起，又何以能流傳下來，漢人的《詩經》學又如何形成等。而作者就原始禮樂的觀點，即周人用詩的方法，來尋求問題的答案，以及其中所展現出來的若干觀點也都得到何定生的認同。但他對顧頡剛不知諷諫作用之為依存於無算樂，且對於歌謠與言情一類的詩所以能入樂的原因，仍認為缺乏真切的認識。又文中未對春秋時賦詩引用淫詩問題有積極的見解，以及作者對孔子「思無邪」之義亦無一語涉及等，都有美中不足之歎。此外，何定生亦不苟同顧頡剛所持之漢人《詩經》學乃源自於孟子的「亂斷詩」之說；而認為另有匪伊朝夕的累積原因，不能全歸責於孟子。在他看來，與其說受了孟子的影響，毋寧說是戰國、秦、

³⁹ 同前註，頁 87。

⁴⁰ 同前註，頁 91。

⁴¹ 同前註，頁 96。

⁴² 同前註，頁 99-100。

⁴³ 同前註，頁 102。

⁴⁴ 同前註，頁 104-105。

漢之儒者對於《詩經》做一種有目的的綜合解釋⁴⁵。

雖然何定生對這篇曾在他青少年時期給予他極大啟發的論文，有著種種的批評，但整體來說，他還是能對顧頡剛此文在當時所發揮的影響及貢獻有充分的肯認，如他認為此文已經「提供了攻擊漢人的《詩經》學一個全面性的戰略」。又說作者係「以一個現代歷史學者的態度和方法來寫文章」。因而此文的發表，「使大家的意識為之一新」。影響所及，「對於詩文的再估價很自然的便成為一時的新風氣」⁴⁶。

除了顧頡剛此文外，何定生還在此類文章中評析了胡適等人的文章，只是篇幅沒那麼多，有些也只是針對個別細節的問題。以下略為撮述其中較為重要的要點。在評論胡適〈談談詩經〉時，他首先肯定該文關於「《詩經》不是那一個人輯的，也不是那一個人做的」的觀念，以為根據此觀念，孔子刪詩說便不足辨。又他對文中強調研究《詩經》要講文法，也認為是很切要的。但他對胡適用社會學的眼光來解詩，則持較保留的看法⁴⁷。此外，他對陳槃〈周召二南與文王之化〉文中脫盡傳統束縛的解詩態度亦有不同的想法，認為如此未必能得其真際。如其對胡適解〈葛覃〉、〈小星〉等詩表示欣賞，但何定生卻批評說：「無異方從漢人的附會陰影中出來，卻又進入另一種新的附會裏去。」他犀利地指出：這也許正是當時解詩新風氣的一般趨向⁴⁸。

（二）就《詩序》問題而言，何定生評析鄭振鐸（1898-1958）〈讀毛詩序〉和顧頡剛的〈毛詩序之背景與旨趣〉二文。他指出鄭文這篇專為攻擊《詩序》而作的文章，在觀點上是與顧頡剛的反漢人態度一致的，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材料還是顧頡剛所提供的。可惜「文筆軟弱，論證常不能切中肯綮」，雖文長不下萬言，卻還不如顧頡剛不過千言的〈毛詩序之背景與旨趣〉之精警切要⁴⁹。何定生概括顧文的論點有二：1.《毛詩序》的方法是以「篇第先後」為「時代早晚、道德優劣、政治盛衰」的標準；2.《毛詩序》乃東漢初衛宏所作，已明著於《後漢書》。然漢以來人必欲推而上之謂為子夏所作，或孔子所作，或國史所作，或詩人所作。何定生認為上

⁴⁵ 同前註，頁 105-106。

⁴⁶ 同前註，頁 75-76。

⁴⁷ 同前註，頁 112-113。

⁴⁸ 同前註，頁 124。

⁴⁹ 同前註，頁 77、127。

述兩點，即足以道出《毛詩序》背景的隱微，也充分說明二千年來尊《序》者篤於信古而甘於自欺的心理。他認為這種心理可能也就是漢人託古改制思想的另一種表現⁵⁰。

（三）關於專書討論的問題，何定生討論了顧頡剛〈重刻詩疑序〉和他自己的〈關於詩經通論〉二文。就前文而言，何定生認為顧頡剛雖有意對王柏(1197-1274)《詩疑》一書的價值加以渲染，但若就其黜「淫詩」一事而論，則無甚新意，因此義乃朱子之餘緒。何定生認為此書的價值仍在其讀詩的態度和方法上，前者誠如顧頡剛所指出的，其表現出不信一切權威（包含毛、鄭、《詩序》、《左傳》，甚至其太老師朱熹），只單就《詩經》白文致力的態度。而在方法方面，顧頡剛也歸納了四種從文本本身與其他文獻相互比勘的精密手段。何定生亦肯定顧頡剛對王柏的功罪所做的持平之論⁵¹。就後文來說，何定生在相隔三十多年後，重新回顧自己的文章，他指出此文係專就姚際恆的反朱及辨偽的獨特精神做重點的提出，但他也反省該文仍存在著若干缺失，包括對前述要點發揮仍嫌不夠；論朱熹反《序》原委反占頗重篇幅，不無喧賓奪主之嫌；及論姚氏見解不如朱熹高明處，所引例證仍嫌不足等⁵²。

（四）關於歌謠問題的討論，何定生亦評析了顧頡剛〈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及魏建功(1901-1980)〈歌謠表現法之最緊要——重奏複沓〉和張天廬〈古代的歌謠與舞蹈〉等四文。在何定生看來，歌謠與《詩經》的關係也是當時討論的重要主題。他概括顧頡剛〈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的大意有兩點：1. 風、雅、頌之分在聲音而不在意義。2. 《詩經》中的歌謠都已成了樂章，不是歌謠的本相，其往復重踏處乃樂工所申述。此文發表後，魏建功〈歌謠表現法之最緊要——重奏複沓〉持相反意見，顧氏為答魏文及兼論程大昌、顧炎武(1613-1682)所謂《詩經》中有部分徒歌之說，遂有〈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的長文。但何定生批評此文以後世歌謠形式來證《詩經》，以為證驗價值不高。而其用《左傳》、《國語》所載之徒歌形式來反證《詩經》之為樂歌，及從《詩經》的形式來判斷其成為樂歌的痕跡二點，也認為只有部分的理由，再加上若干解釋的問題，

⁵⁰ 同前註，頁 129。

⁵¹ 同前註，頁 77、134。

⁵² 同前註，頁 77-78。

所以判斷論據並不強固⁵³。總體來說，何定生認為《詩經》所錄皆為樂歌，《儀禮》本身即足以證明，而顧頡剛欲從歌謠關係上來求其證驗，便轉多凝滯⁵⁴。魏文及張文皆為批評顧文而發，何定生對魏文沒有太多具體評論，張文則對其批評顧文論〈桑中詩〉及以漢樂府例《詩經》之不可靠，以為「甚得間」。而對其論歌舞的關係大致同意，但對他疑《儀禮》所載〈鹿鳴〉「鼓瑟吹笙」為後人所加，及疑樂工不能製譜等則不予苟同⁵⁵。

（五）起興問題的討論在當時也是一個相當被重視的課題，這方面的文章有顧頡剛〈起興〉、朱自清(1898-1948)〈關於興詩的意見〉、劉大白(1880-1932)〈六義〉與何定生的〈關於詩的起興〉等文。何定生認為顧文完全主鄭樵「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的見解，因而說起興就是借聲起句，也可說是協韻起頭說⁵⁶。朱自清則主「從當前習見事物指指點點地說起，便是起興」，但何定生比較朱自清與顧頡剛之說，發現朱氏主張「興是直說此事以象徵彼事」，較顧說多了「象徵」的觀念，而這不單純是聲音的問題。他認為漢、宋人把此關聯（直說此事與彼事）說得太重了，因此比興分不清；但鄭樵和顧頡剛又把聲音以外的關係看得太輕了。他認同朱說，覺得他所指出的象徵關係也是興詩應有之義⁵⁷。至於劉大白對賦比興的關係之說法，何定生認為亦近於朱自清，蓋其無一語及於聲音，明顯和鄭樵、顧頡剛不同⁵⁸。他坦承自己早年的主張淵源於鄭樵，又暗合於顧頡剛的協韻起頭說。但他此時的想法顯然有了較大的修訂，即開始認為起興的句子之聲音和意義的關聯是相對的，可能只是純粹無意義的聲音，但有時也可能是有意義的。他對此問題的看法可能受到朱自清的影響，雖不否定興詩主要的方法在聲音的變換，但也注意到了詩意的暗示或象徵的作用之可能⁵⁹。

（六）在詩解舉例的評析中，何定生回顧了當時被熱烈討論的詩篇，包括〈邶風·靜女〉、〈召南·野有死麕〉、〈召南·小星〉、〈鄭風·野有蔓草〉等十幾篇

⁵³ 同前註，頁 78。

⁵⁴ 同前註，頁 175。

⁵⁵ 同前註，頁 179。

⁵⁶ 同前註，頁 79、181-182。

⁵⁷ 同前註，頁 79、183-184。

⁵⁸ 同前註，頁 185。

⁵⁹ 同前註，頁 79、186-187。

詩。何定生對當時所進行的詩解討論做了整體的回顧：他認為詩旨的客觀解釋是當時《詩經》問題的討論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但傳統的漢、宋、清學的解釋都受到《毛詩序》和漢儒思想的籠罩禁錮。因而今日要給原始的《詩經》一個客觀的解釋，非從漢、宋、清學的基本觀念上解放出來不可⁶⁰。但舊解釋固然要丟棄，新觀念的引進是否就一定合於客觀的要求呢？觀其對胡適用社會學的眼光解〈野有死麕〉和〈小星〉的批評⁶¹，以及擔心解詩為掙脫舊傳統的狂熱而走向極端的情況⁶²，就可知何定生對此亦不免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總的來說，在這六類《詩經》研究論文的評論中，雖然看似頭緒有些紛雜，所論列的學者及論著亦頗繁多，但仍是理出貫串其間的主要脈絡，亦即他對顧頡剛表現在《古史辨》中的《詩經》研究成果的把握與對話。在一般綜合問題的評論中，何定生特別針對顧頡剛的〈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做細緻的評析。對《詩序》問題的討論中，他也特別標舉顧頡剛〈毛詩序之背景與旨趣〉的觀點。而關於專書討論的問題，他主要討論的就是顧頡剛的〈重刻詩疑序〉和他自己的〈關於詩經通論〉。在歌謠問題和起興問題的討論中，顧頡剛的文章及論點依然是其論述的焦點。雖然不完全都是正面肯定的評論，時有尖刻銳利的批評，但由此也可以看出顧頡剛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身為參與者或局內人的何定生眼中的《古史辨》的《詩經》研究，固然對當時的成果有種種的批評，但總的來看，他的思想意識及方法觀念還是處於新文化運動當時所謂「啟明期」中，他所批評致憾者倒不是那些背離啟明期所追求的復古解放思想之研究成果，而是嫌其不夠徹底，或又為新的權威所宰制。他所追求的應是對啟明期當時所主導的方法意識之持續深化，而這樣的學術史觀確實是與身為旁觀者或局外人的《詩經》學者頗為不同。比較兩位同樣對二十世紀《詩經》學史進行研究的當代《詩經》研究大家——夏傳才與趙沛霖——在其大著中均有評論《古史辨》的《詩經》研究的篇章。但要麼從不同的史觀立基點加以評析（夏著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要麼從客觀的時代學術文化思潮與學術史的建構模式來評析（趙著）。均

⁶⁰ 同前註，頁 188。

⁶¹ 同前註，頁 76、192-194。

⁶² 同前註，頁 200。案：何定生對此現象舉的例證是魏建功將〈魏風·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翻譯成：「唉，那些混帳王八旦，無菜不下飯！」

與何定生的評騭大相逕庭⁶³。但令人感到可惜的，是何定生對《古史辨》的《詩經》研究的相關論說卻未被包括夏傳才與趙沛霖等大多數當代《詩經》研究者所注意及利用，這對現當代《詩經》學史的研究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缺憾⁶⁴。

四、結 論

通過前面的考察可知，何定生不但是不折不扣的古史辨派的學者，而且他還一直延續保有古史辨派所擁有的思想意識與方法觀念，當年為他整理遺稿的曾志雄教授看得很清楚，其云：

他處理的雖是些古老（或傳統）的問題，卻用比較（或整合）、批判、復原、解釋等方法和態度來進行。這些方法和態度，顯然是顧頡剛疑古派的一個衍生型態。⁶⁵

而他對《古史辨》的肯定也可從他晚年為《古史辨》臺灣版所寫的序言中看出：

這個三百萬字巨著的出現，事情雖是由顧先生個人發端，書中的編排，也顯然代表了顧先生個人思想的成長；但實際上這部書也正反映了三十年代那個「新思想運動」的客觀背景。……《古史辨》雖不必對於古史問題解答了什麼，但只這二百萬字的紀錄本身，就已不失其為一個新興世代的思想抽樣，值得所有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的人們參考了。⁶⁶

他在《詩經》研究方面更是繼承了《古史辨》的方法，曾志雄曾如此敘述何定

⁶³ 夏傳才的論點見其所撰《詩經研究史概要（增注本）》（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75-189；《二十世紀詩經學》，頁104-111。趙沛霖的論點見氏撰《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55-85。

⁶⁴ 以臺灣當代《詩經》研究大家趙制陽為例，他曾撰有〈古史辨詩經論文評介〉（收入氏撰：《詩經名著評介》〔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3年〕，第2集，頁507-627）之長文，亦將《古史辨》中之《詩經》論文分為：一般問題討論、《詩序》問題、《詩經》論著評介、詩篇討論、《詩經》與歌謠的關係、六義與起興問題等六類，除次序與類名字詞稍有不同外，幾乎完全同於何定生的分類。但趙先生文中除了評介何定生登載在《古史辨》的文章外，並未提及何定生〈詩經的復始問題〉這篇文章，而其文章論點也未見引用或因襲何定生此文的痕跡，顯然趙文並未受何文之影響。

⁶⁵ 曾志雄：〈理稿報告〉，引自何寄澎：〈後記〉，《定生論學集——詩經與孔學研究》，頁196。

⁶⁶ 何定生：〈寫在古史辨臺灣版的編首〉，《古史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第1冊，頁1。

生《詩經》研究的特色，其云：

何老師研究《詩經》從古字義和古代禮樂制度出發，注重探求《詩經》的原始面貌和時代意義，以此填補古史辨派對《詩經》研究的不足，這是一般人不易為之的事。由於他親身經歷古史辨派的洗禮，對當時《詩經》研究的情況瞭如指掌，所以晚年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在世的最後幾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詩經今論》，該書一方面挖掘過去「疑古派」在討論《詩經》上的不足，特別著力於〈雅〉、〈頌〉禮儀意義的探討；一方面也深入而有系統地闡述了漢人對待《詩經》的態度，以及這種態度對後人的影響。書中對《詩經》問題前後照應，可以說繼往開來；在評述學者觀點時深入淺出，尤見識力，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文章中看問題之準，找證據之精，更往往叫人歎為觀止。⁶⁷

而這也反映在他對《古史辨》的《詩經》研究的整體評價上。他認為民國二十年代前後關於《詩經》復古解放問題的討論，雖時間推移十餘年，空間也從上海延伸到北平、廣州等地的二十餘種刊物，包括了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的研究刊物，統計大小論文五十餘篇，總篇幅不下三十萬字，但事實上只是古史問題的一個流波，其中只有顧頡剛的〈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和〈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二篇長文「具有全面性的重要意義」，其餘大都只是支節或個案的討論而已⁶⁸。於《古史辨》的《詩經》研究中獨許顧頡剛的成就與貢獻。

他對顧頡剛的《詩經》研究不只有繼承、肯定而已，他更有所開展與突破，何定生晚年自述其數篇《詩經》研究論著有一個共通的基點：「就是藉禮樂的觀點，來解答《詩經》所發生的問題。」他認為：「這是個重要的觀點，也是個新的觀點。」他批評過去的學人，雖然並非不知道《詩經》和禮樂原始關係的事實，但只重視主觀的義理解釋，卻完全忽略了禮樂關係的重要性⁶⁹。唯獨顧頡剛「曾嘗試對此事，作全面的探討，已觸及問題的核心」，但在他看來，卻依然不能掙脫鄭玄(127-200)見解的網羅，所以雖有足夠的破壞力但，卻缺少建設性的結論⁷⁰。因而總結來說，他評價顧頡剛的工作：

⁶⁷ 曾志雄：〈永遠的懷念——紀念何定生教授逝世四十週年〉，頁 72。

⁶⁸ 何定生：〈詩經的復始問題〉，《詩經今論》，頁 79。

⁶⁹ 以上見同前註，頁 1。

⁷⁰ 何定生：〈詩經與樂歌的原始關係〉，《定生論學集——詩經與孔學研究》，頁 23。

仍沒有掃清漢以來《儀禮注》所加於詩樂關係的玄談，還原《詩經》在禮樂用場中（即樂次）的本來面目。作個比喻，顧氏已經走到百尺竿頭，就是缺少更進的一步。⁷¹

何定生要致力的就是這「更進的一步」，也就是對「《詩經》樂歌關係的再檢討」。這種關係再檢討的意義，他在〈寫在古史辨臺灣版的編首〉文中有很清楚的陳述：

今日的《詩經》研究，不正該起碼從恢復其樂歌的原始地位做起麼？我們今日研究《詩經》，若不能從乾嘉學人——即清學的漢學的壁壘中出來，以復於原始的樂歌地位，也就是說，今日我們研究《詩經》，若不能從陳奐、馬瑞辰、胡承珙，乃至姚際恆、魏源等的頭腦思想解放出來，以復《詩經》於《儀禮》的樂歌地位，而欲盼望求得三百五篇詩原始解題的本真，那是不可能的。再換個講法，我們今日研究《詩經》，若仍不能放棄陳奐、馬瑞辰等人的思想方法，那樣讀《詩經》，那仍不過是等於玩古董那樣的奢侈生活，不是此時此地所應該提倡的。我們今日讀《詩經》，惟有站在《儀禮》的樂歌地位，從人性的同類意識來接觸人性，才有碰到詩人靈感的可能。這是今日研究《詩》起碼應建立的新世代觀念。⁷²

可以說，他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承續了顧頡剛《詩經》研究的成果而再加以開展、突破。

何定生的成就為其中山大學的老同學陳槃所充分肯定，他高度評價了何定生在這個問題上的貢獻：

〔何定生〕平生精力所詣，蓋在先秦舊學，而《詩經》與樂歌的原始關係一文，則又其獨往獨來、自成一家之作。……《詩經》與樂歌關係，古人言之矣。然二千年來學者，徒知其然，而不能道其詳。至於定生，然後能辨識「正歌」與「無算樂」，徵之《詩》本經與《儀禮》、《禮記》，以暨《左傳》、《國語》等，本本原原，如合符節，而使吾人讀其文者，一旦之間，昭若發矇。⁷³

而顧頡剛晚年在收到曾志雄寄贈給他的何定生著作後，也在《日記》中如此寫下他

⁷¹ 同前註。

⁷² 何定生：〈寫在古史辨臺灣版的編首〉，《古史辨》，第1冊，頁1-2。

⁷³ 陳槃：〈題記〉，《定生論學集——詩經與孔學研究》，頁1。

的心得：

其所論《詩經》與孔學，實為我論學諸文之發展。惜哉此人，如此早逝，真可悲也。⁷⁴

又：

書中有〈詩經與樂歌的原始關係〉長文，將《詩經》與《儀禮》詳細關係鉤索而出，以駁正余倉卒所為之〈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之說，使我心服。⁷⁵

對於渴望能再見到顧老師的何定生，顧頡剛的評價應該會讓他感到非常振奮。

對何定生著作、思想及晚年生活極為熟悉的曾志雄教授回憶其師的豪情壯志：

他對自己的《詩經》專題研究表現深具信心。他曾經自豪地對我說了不只一次：〔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詩經》的 Koo's Age（顧頡剛時代），現在是《詩經》的 Ho's Age（何定生時代）。⁷⁶

從他對顧頡剛《詩經》研究的開展與突破，以及獲得顧頡剛本人的認肯這點來看，何定生的自豪完全是有所據的，只可惜天不假年，未能讓他再充分發揮其所學，這不但是何定生個人的不幸，也是《詩經》學界的損失。

⁷⁴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11，頁 695，「1979 年 10 月 9 日」。

⁷⁵ 同前註，頁 698，「1979 年 10 月 25 日」。

⁷⁶ 曾志雄：〈永遠的懷念——紀念何定生教授逝世四十週年〉，頁 72。

附錄：何定生教授論著目錄（增訂稿）⁷⁷

本目錄輯錄原則盡可能蒐尋何定生教授所發表的所有文章，何教授除用本名發表外，尚有用「定生」及用筆名「更生」的方式發表文章。惟署名「更生」在報刊發表文章者甚多，為求謹慎，除何教授有在〈簡歷〉及《日記》中提及者外，一概暫不收錄。

一、專書

1. 《元雜劇選》，1929年8月，未刊。

案：此書為何教授奉顧頡剛命所編成，共十二萬字，原稿已佚失。

2. 《詩的聽入》，北平：樸社，1929年8月《的礫小叢書》之一。
3.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及其他》，北平：樸社，1929年9月《的礫小叢書》之二。
署名定生編。

案：此書原題作《關於胡適之與顧頡剛》，共收十篇文章，其中何教授撰寫的篇目如下：

- (1) 〈又來「罵」胡適之先生〉，頁9-23。
- (2) 〈願胡適之先生勿懺悔〉，頁25-46。
- (3) 〈再寫在〔陳〕槃的文後〉，頁77-89。
- (4) 〈「新」「舊」材料與治學方法問題〉，頁145-166。

4. 《詩經今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6月初版、1969年8月2版、1973年3版《人人文庫》。

案：本書共收三篇論文，依次是：

- (1) 卷一〈從樂章到諫書看詩經〉，頁1-72。此文原題作〈從言教到諫書看詩經面貌〉，係何教授獲得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簡稱長科會）1964年研究獎助論文，原刊於《孔孟學報》第11期，1966年4月，頁101-148。
實際寫作時間為1965年6月。
- (2) 卷二〈詩經的復始問題〉，頁73-202。此文原題作〈詩經的復古解放問題〉，係何教授獲得長科會1965年研究獎助論文。

⁷⁷ 車行健、徐其寧（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輯錄，增訂條目以星號標示。

- (3) 卷三〈詩經的解釋發凡〉，頁 203-291。此文原題作〈詩經的解釋問題〉，係何教授獲得長科會 1966 年研究獎助論文。其中「宋儒對於詩經的解釋」一節另以〈宋儒對於詩經的解釋態度〉為題，收入林慶彰編，《詩經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 年 11 月，頁 409-422；「清儒對於詩經的見解」一節亦以原題收入林慶彰編：《詩經研究論集》，頁 423-444。
5. 《定生論學集——詩經與孔學研究》，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 年 7 月。
案：此書共收四篇論文，依次是：
- (1) 〈讀詩綱領〉，頁 3-13。
- (2) 〈詩經與樂歌的原始關係〉，頁 17-94。此文原題作〈詩經的樂歌關係的檢討〉，係何教授獲得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簡稱國科會）1967 年研究獎助論文，原刊於《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18 期，1969 年 5 月，頁 353-416。此文第二節「從詩經本身看樂歌關係」，又收入林慶彰編：《詩經研究論集》，頁 1-18。
- (3) 〈孔子的傳記問題與六經〉，頁 97-156。此文原題作〈六經與孔子的關係〉，刊於《中央日報》，1959 年 4 月 28 日第 3 版。
- (4) 〈孔子言學篇〉，頁 159-194。此文原刊於《孔孟學報》第 6 期，1963 年 9 月，頁 41-68。

二、單篇論文

- *1. 〈詩經的文學觀〉，1925 年。
案：見〈詩經之在今日〉，此文似未刊。
2. 〈山海經成書之年代〉，《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2 集第 20 期，1928 年 3 月 13 日，頁 600-605。
案：此文撰於 1927 年 6 月 24 日。
3. 〈漢以前文法研究〉（一至三），《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3 集第 31 期，1928 年 5 月 30 日，頁 1025-1036；第 32 期，1928 年 6 月 6 日，頁 1059-1067；第 33 期，1928 年 6 月 13 日，頁 1095-1112。
案：前二文撰於 1928 年 4 月 28 日，第三文未書撰作時間。
- *4. 〈譯詩的討論〉，廣州《民國日報》「晨鐘」副刊第 25 期，1928 年 6 月 20 日。
署名定生。

案：此文為回應李少白〈關於〈不屈〉〉（廣州《民國日報》「晨鐘」副刊第20期，1928年6月14日）對其翻譯英國詩人 W. E. Henley (1849-1903) 〈不屈〉一詩之質疑所作，自署作於1928年6月14日。

5. 〈詩經之在今日〉，原載廣州《民國日報》副刊，1928年7月17日，後收入《古史辨》，第3冊下編，北平：樸社，1931年11月，頁690-694；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3月；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11月。

*6. 〈王充及其學說〉（一至六），廣州《民國日報》「現代青年」副刊，1928年10月6、8、9、10、16日。

案：此文文末作者自署1927年10月8日作於中山大學。又何教授〈簡歷〉作〈讀論衡〉，且註明登載出處為廣州《民國日報》「晨鐘」副刊，然未詳刊載時間。又案：此文（一）未見於人民出版社1985年影印出版之《民國日報》當年當月分的合訂本中，且此套《民國日報》亦缺1928年7-9月，疑即在其中，當續訪查。

7. 〈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5集第49-51期合刊，「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專號」，1928年10月17日，頁1793-1799；前有「作者的告白」，頁1783-1792。

案：此文撰於1928年10月。

8.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年報序〉，《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6集第62-64期合刊，1929年1月16日，頁2381-2386。

案：顧頡剛於1928年12月16日的《日記》中記道：「託定生代作〈研究所年報序〉。」（《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卷2，頁232）然又據顧頡剛1929年2月6日《日記》道：「作〈研究所年報序〉粗畢，共五千二百言。」7日《日記》亦記道：「修改〈年報序〉訖，即送校付刊。」（《顧頡剛日記》，卷2，頁250）明謂顧氏自作及修改該文。且顧潮編《顧頡剛年譜》，於「著述目」中亦明列顧氏撰作此文。（見《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469）則此文似仍主要是顧氏自作。

*9. 〈本部所藏中國古器物書目〉，與何之合編，《中山大學圖書館周刊》，1929年6月，頁101-117。

10. 〈關於詩經通論與詩的起興〉，《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9集第97期，1929年9月4日，頁3783-3794。

案：此文撰於 1929 年 5 月。「關於詩經通論」部分又收入《古史辨》，第 3 冊下編，頁 419-424，及林慶彰編：《詩經研究論集（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 9 月，頁 541-545。關於「詩的起興」部分，亦收入《古史辨》，第 3 冊下編，頁 694-705，改題作〈關於詩的起興〉。

11. 〈宣統政紀考證〉，燕京大學《史學年報》1941 年。

案：此條目據何教授〈簡歷〉所記，然燕京大學歷史學會主編之《史學年報》自 1929 年 7 月 10 日出版第 1 卷第 1 期，至 1940 年 12 月第 3 卷第 2 期出版後即中斷，共計發行 3 卷 12 期。翻查其中篇目與作者，均無何定生撰作紀錄。又據何教授〈簡歷〉云，此文曾獲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

- *12. 〈婦女在文化上的地位〉，《婦聲半月刊》第 1 卷第 7 期，1947 年 1 月，頁 5。

案：此文作於 1946 年 12 月 19 日。

- *13. 〈國際新刊介紹：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故事〉，天津《益世報》「國際周刊」第 35 期，1947 年 4 月 2 日。署名更生。

案：此文乃評介美國史學家 Henry Steele Commager (1902-1998) 所撰之 *The Story of the Second War*,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5。

- *14. 〈損失太大了〉，《傅故校長哀輓錄》，國立臺灣大學紀念傅故校長籌備委員會哀輓錄編印小組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51 年 6 月 15 日，頁 76。

案：此文作於 1950 年 12 月 27 日，原刊《臺大校刊》第 101 期。

15. 〈評介詩經釋義〉，《學術季刊》第 2 卷第 1 期，1953 年 9 月 30 日，頁 136-138。

16. 〈六經與孔子的關係〉，《中央日報》，1959 年 4 月 28 日第 3 版。

17. 〈孔子言學篇〉，《孔孟學報》第 6 期，1963 年 9 月，頁 41-68。

18. 〈從言教到諫書看詩經面貌〉，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 1964 年研究獎助論文，刊於《孔孟學報》第 11 期，1966 年 4 月，頁 101-148。

19. 〈詩經的復古解放問題〉，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 1965 年研究獎助論文。

20. 〈詩經的解釋問題〉，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 1966 年研究獎助論文。

21. 〈關於論語的若干解釋〉，《中央日報》1966 年 8 月 18 日副刊第 9 版。署名更生。

22. 〈再論論語佛肸章的匏瓜問題〉，1966 年 8 月。

案：本文似未刊，見楊晉龍：〈何定生教授年表初稿〉，《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 20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18。

23. 〈詩經的樂歌關係的檢討〉，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 1967 年研究獎助論文，改題作〈詩經與樂歌的原始關係〉，刊於《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18 期，1969 年 5 月，頁 353-416。

案：據作者自述，此文為《詩經》論文之第四篇，題為「《詩經》今論卷四」。

24. 〈從儀禮的樂歌分類規三百篇的原始解題〉，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 1969 年研究獎助論文。

案：此文實際完成時間為 1969 年 4 月 28 日。

25. 〈寫在古史辨臺灣版的編首〉，《古史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 年 3 月初版，第 1 冊，頁 1-2。

案：此文撰於 1970 年 1 月 5 日。

* 三、文藝創作

1. 〈一朵美麗的青花〉，《文學週報》，第 4 卷第 251-275 期，1928 年，頁 610-622。

案：此文撰於 1928 年 3 月 8 日。

2. 〈我的心〉，廣州《民國日報》「現代青年」副刊，1928 年 12 月 3 日。署名定生。

3. 〈母親的淚——心的創痕之一〉，《一般》第 8 卷第 1-4 期，1929 年，頁 311-312。署名定生。

* 四、譯著

1. 〈不屈〉，W. E. Henley 原作，廣州《民國日報》「晨鐘」副刊第 7 期，1928 年 5 月 30 日。署名定生譯。

2. 〈我何能離你〉，德國 Thuriogian 民族的民歌，廣州《民國日報》「晨鐘」副刊第 13 期，1928 年 6 月 6 日。

案：譯於 1928 年 5 月 31 日。

3. 〈愛的祕密〉，William Blake 原作，廣州《民國日報》「現代青年」副刊第 107 期，1928 年 9 月 11 日。

4. 〈德芬的姑娘——寄給 B. R. Haydon 的詩〉，John Keats 原作，《一般》第 9 卷第

1-4 期，1929 年 10 月，頁 235-238。署名定生譯。

5. 〈國際辭林〉（輯譯，共六篇），天津《益世報》「國際周刊」第 30、31、34、38、39、42 期，1947 年 2 月 26 日、3 月 5 日、3 月 26 日、4 月 23 日、4 月 30 日、5 月 21 日。署名更生或編者。

案：此條目據何教授〈簡歷〉所記，原作刊於 1946 年天津《益世報》「國際周刊」之「國際新辭」，且未載期數及月日。又案：天津《益世報》「國際周刊」之「國際辭林」欄目於 1947 年 2 月 26 日該周刊 30 期時始創，何教授即為初始撰稿者，故次期（31 期）「國際周刊」之「國際辭林」欄目僅署名「編者」，疑亦何教授所撰。

6. 〈英國的襲擊隊——大戰史話之一〉，天津《益世報》「國際周刊」第 35 期，1947 年 4 月 2 日。署名更生。

案：此條目據何教授〈簡歷〉所記，原作刊於 1946 年天津《益世報》「國際周刊」之〈大戰故事〉（二次大戰史料輯譯），且未載期數及月日。又

案：此文譯自 Henry Steele Commager 所撰之 *The Story of the Second War*。

五、書信及個人傳記資料

1. 〈致顧頡剛〉（撰於 1928 年 3 月 8 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2 集第 20 期，1928 年 3 月 13 日，頁 640。
2. 〈致顧頡剛〉（撰於 1928 年 5 月 1 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3 集第 30 期，1928 年 5 月 23 日，頁 1011-1013。
3. 〈致顧頡剛〉（撰於 1928 年 5 月 25 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3 集第 32 期，1928 年 6 月 6 日，頁 1088-1089。
4. 〈致余永梁〉（撰於 1928 年 5 月 27 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3 集第 33 期，1928 年 6 月 13 日，頁 1132-1133。
5. 〈致余永梁〉（撰於 1928 年 5 月 25 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4 集第 39 期，1928 年 7 月 25 日，頁 1415-1416。
6. 〈致顧頡剛〉（撰於 1928 年 6 月 1 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4 集第 40 期，1928 年 8 月 1 日，頁 1447-1449。
7. 〈致顧頡剛〉（撰於 1928 年 7 月 9 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4 集第 42 期，1928 年 8 月 15 日，頁 1513-1514。

8. 〈致顧頡剛〉（撰於 1928 年 7 月 31 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5 集第 49-51 期合刊，1928 年 10 月 17 日，頁 1980-1981。
9. 〈答衛聚賢先生〉（撰於 1928 年 10 月 18 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5 集第 53、54 期合刊，1928 年 11 月 7 日，頁 2087-2096。
10. 〈致楊筠如〉（撰於 1929 年 5 月 20 日），《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8 集第 91 期，1929 年 7 月 24 日，頁 3650。
11. 〈簡歷〉，臺灣大學人事檔案，1949 年 8 月填寫。
12. 《日記》，未刊。

案：何教授遺存《日記》始於 1949 年 11 月 2 日，止於 1970 年 6 月 23 日。